

# 试谈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黄 猷

一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东南亚大体上是在两个时代通过两个渠道。第一，在历史上东南亚等某些地方曾经处于中国直接的管辖之下。如：宋以前的安南，其他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中国是他们的宗主国的更为普遍。从印度支那半岛到暹罗到缅甸到马来亚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以至菲律宾群岛，对中国的朝贡和制度化的朝贡贸易一直延续到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因而天朝的政治制度、宫廷文化以至汉字对东南亚都有长期的影响，甚至印度尼西亚早期的伊斯兰文化，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就被当地化或者边缘化了。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后，中国的影响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是文化，更是逐步被削弱以至掩盖了。第二，清朝末年承认华侨为帝国的臣民，在东南亚西方各国的殖民地，设领馆、办商会、建学校，吸收华侨子弟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和进学堂受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得以通过华侨在当地传播，并成为华侨社会的主导文化。但时间不长，覆盖面也不大，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在东南亚包括华侨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扎下根子。

二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最广，而且长期占优势的是民间文化。它的载体是早期华侨，在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当地已有许多早期华侨的定居点，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按照家乡手工业行会的模式把分散的移民群体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和当地社会有联系但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的自治的小社会，依靠从家乡带来的比当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能力在当地立足。他们是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最强大的对手，当西方殖民者感到无法控制他们的时候，就以暴力来消灭他们。如菲律宾的“八连事件”、印尼的“红河事件”、婆罗州的“三发公司事件”，都曾经是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而这批早期华侨的文化遗存也就是保留于峇峇文化中的生活方式，礼仪和祖先崇拜而已。十九世纪末，为开发的需要，西方殖民者又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契约华工和其后的自由移民。而这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加速破产，又为华侨的出洋谋生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但这些数量众多的华侨劳工，不是被放在西方殖民者的庄园里就是分散在城市中出卖苦力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雇佣劳动者，为了互相支持和自卫，他们就按照家乡破产农民、会党组织的形式组成了生活共同体即通称公馆、公司。这是单身男子在自愿结合、自愿互相承担义务的原则下的社会组织，其核心的价值观念也就不再是中国中华社会的三纲五常，而是协议。以后华侨越来越多，出现了各种血缘和地缘组织。但在不少地方会党仍然是把血缘地缘组织连接在一起的巨大的网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会党之间也不断出现派别和争斗。但其在不同派别的会党，其核心价值还是同样的。在华侨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之

前，会党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变异，实质上就成为华侨社会文化的主流。支持早期华侨在当地立足于发展的正是这种具有个性解放意识，敢于冒险、敢于创新，而又在群体遭遇威胁时敢于挺身而出，做出牺牲的会党文化，而不是一些新儒家所凭空假想的儒家传统文化。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东南亚各属的殖民经济体制逐步形成。西方殖民者既要利用华侨的商业经营能力，又要使其为殖民经济服务。因而将华侨定位为中介商即土产收购商和洋货推销商。而进出口贸易则由洋行垄断，不少地方如印尼和菲律宾，殖民者不允许华侨占领土地从事农业活动，因而留给华侨的就只有中小型商业和商业职工的位置。但是殖民经济体系是逐步形成的，有些地方如马来亚和安南，殖民统治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发展而建立的。这就使华侨工商业能够在空缝中生存和成长，如物质供应商、建筑承包商、小型的钱庄和信贷业。而工业原料的生产和初级加工，更为华侨原始资本的积累和现代化企业的组织提供了发展空间，如锡矿开采、橡胶种植和初级加工等等。这一批华侨工商业者实际上是东南亚第一批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既要对付洋行的垄断和超经济剥削，又面对同行的竞争，这就使他们在前资本主义商业的诚信原则上还需要一种新的经营观念和精神支柱。而这时在中国由严复编译的《天演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的思潮，正成为广大知识界的共识。并通过报刊、书籍传到南洋，传到东南亚，这正好满足新兴的华侨商人阶层的需要，因而从物竞天择引申出来的商场如战场，商战观念就在第一时间里成为新兴华人商人阶层的经营理念以至生活理念，并一代一代流传下来。而由于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他们也有意回避政治，因而又出现了所谓“在商言商，不问政治”的传统的生存哲学。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进入东南亚的第二波，但事实上，这不是传统的中华文化，而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经过吸纳、消化、重新成形的产物了。

在亚洲民族开始觉醒的条件下，华侨新兴商人阶层的这种生存竞争的意识被引向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会党模糊的反清复明的传统观念被重新解读为现代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和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影响下，华侨社会孕育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孙中山所说的：华侨出钱、会党出人，实质上就是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华侨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把会党的反抗意识领导到了民主革命的轨道上来，形成了缔造民国的核心力量，并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把民主革命的思想在中国大地上普遍传播。

### 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批革命者和进步的文化人逃亡东南亚。他们在华侨学生和工人中传播了社会革命的种子，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于1933年前后波及东南亚，造成了经济的不景气和衰退，这样的土壤就使社会革命的种子得到了萌发的机会。首先出现的是以华文报刊为载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浪潮，开始曾经出现两种主张，是写当地（揭发批判当地的社会问题），还是写中国（反映中国的革命运动），但事实很快证明只有写当地，接触当地的社会问题才能够在当地生根，这个方向被坚持下来。在政治上引导华侨介入当地政治，在文化上即开创了华侨文学的新方向。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华侨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左翼的学生工人运动也随着这种爱国主义的高潮而推动了各行各业以至华侨上层社会的救亡活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在东南亚不少地方，当地的和华侨中的共产党人承担起了组织抗日武装斗争的任务，成为当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左翼政治力量和社会革命的思潮的影响在华侨社会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随着西方殖民者的重返东南亚，除印尼外各地的独立运动普遍受到挫折。而当西方殖民者被迫转移政权给当地人民时，他们所扶持的是资产阶级政权，左翼政治力量被镇压下去，左翼文化运动也成为禁区，但是不少地方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就在反法西斯战争和独立斗争中出现和形成，华人社会中这种积极因素也读华文学校、华文报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并被带进了其后的华人社会。

#### 四

由于华侨的进步政治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当地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核心力量，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以华侨为骨干，因此在西方殖民者重返东南亚的时候华侨就被视为潜在的和假想的敌人。加上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为了发展和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普遍实施了扶持当地原住民的经济政策。首先受到打击、被取代的就是华侨经营的零售商，一些地方还先后采取了限制华侨学习母语以至禁止他们使用汉语汉字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学习母语的权利，保卫族群文化就成为一个相当时期以内华侨社会无可回避的挑战，这是文化斗争实际上也是政治斗争。而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各地华文学校也就逐步从中国本位走向当地本位，但又相对独立于当地教育制度的一种华文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鼓励华侨参加当地国籍，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就是要把对华侨的中国公民教育改变为符合他们在当地生存发展需要的文化教育。简单的说就是从要求他们认识和认同于中国改变为帮助他们认识和认同于当地，这种鼓励和推动华侨当地化的工作经过一段时期艰苦的努力和环境的变化，在已经成为当地国家公民的华人中逐渐取得共识。但直到今日对于当地化的内涵还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把当地化理解为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尽公民的义务，以当地政府给予华人族群的地位和待遇为满足；另一种解读则是华人的当地化要以当地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为前提，即华人应该在和当地原住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参与和推动当地的现代化、民主化中实现当地化。华人作为当地公民要尽当地公民的义务，但在他们还没有取得与当地原住民和其他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条件下，还应该注意维护族群的团结以争取实现平等的公民权利。近年来出现的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和融入当地社会两种方向之争就是来自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在华人人口占当地人口一定比例的国家，还出现了一种“共生的理论”，即华人的前途不是与当地原住民族融合而是共生，或者说与当地原住民族的关系是独立而不分裂。

当地化不论是个人无条件的成为当地大社会的一员或者是保持族群文化。以族群的形态融入当地大社会，或者是华人族群与当地各民族共生，都要求华人在文化的深层次上，也就是价值观念上有一

个明显的转变，就是要从中华文化脱胎而出，探索和建构当地的华人文化。也就是说为了在当地大社会中的自我定位要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梳理自己所传承的中华文化因素，包括族群集体记忆的奠基，分析当地文化的影响，反思西方文化对改变当地社会和华人生存条件的作用。从中探索适合于华人生存发展的文化形态，各地在建构当地的华人文化中也必然会继续从吸纳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中受益，但其出发点并不在弘扬中华文化。

近年来随着华人当地化程度的加深，一部分华人和华人组织也已经走出了长期以来集中注意力于维护族群礼仪保卫族群文化的局限性。而直接参与了当地各民族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民主的斗争，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华侨时代在商言商的传统因而逐步被扬弃，但一种新型的华人政治文化还待探索。

## 五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历史经验说明一种异文化因素要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在当地生根和起作用是有条件的。早期华侨带去的生活方式是以相对高于当地的农业生产力为载体的，会党的组织形式在一个时期成为当地华侨社会结构的模式，是由于他符合于当时华侨团结互助、共同承担风险以取得生存空间的需要。商战观念的广泛传播是因为他反映了新型的华侨商人阶层发展壮大需要，社会主义思潮的被华侨进步份子所接受，这是由于他可以成为反法西斯斗争和民主独立斗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革命力量的精神支柱。概括起来说，他必须是在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代表一种更高的水平一种前进的方向。

当前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是多方位多渠道的。第一，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就必然要发生影响。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活动方式也就随着它对东南亚的贸易投资而直接成为东南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因素。第三，国际汉语教育发展到现在全世界普遍建立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在东南亚凭借着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文化交流就更容易在当地社会、当地各民族中有一定的覆盖面。第四，华人的华文教育它虽然已从为弘扬中华文化服务转化为建构当地的华人文化服务，但仍然会不断吸纳中华文化并在当地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样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就需要考虑如何适应当地社会发展需要，而不仅是华人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不论是对当地社会还是对华人社会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就必须要以中国现代的文化、科学技术为主线，而不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线。当前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有一种误解，因而在实际工作形成当中造成误导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很丰富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人生哲学，但总的来说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儒家从孔孟到汉儒到宋儒以及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极大多数是对统治者的说教，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至宋儒的内盛外亡，都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叫统治者通过“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巩固建立在中华社会上的政权。少数如老子庄子则是对于小国寡民时代以至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怀旧和对现实剧烈的攻杀兼并的回避“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寿夭”把一切对立都化解了。这种传统文化不能反映现在的社会生活，促进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许多人所侈谈的传统文化“国学”只是断章取义，自我做古，并不是真正传统的精英文化。这种现象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一是对于我们长期强调阶级斗争的反弹，把儒家立足于等级身份制度的礼教错误解读为民胞物予的仁政，甚至将其提升为人文关怀、人道主义，而是不能够走出传统文化中文化专制主义的局限性，总是希望自己的信念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定于一尊，而很少考虑自己所理解与传播的是否适合传播对象的需要。越是肤浅就越是浮夸，无知者无畏！还有人将在华侨社会广泛流传的各种民间信仰以至民俗礼仪如舞龙舞狮抬高到传统文化的层次。不能否认民间信仰民俗礼仪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但不能盲目的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来对待，这种复古主义的陷阱是必须警惕的。

第二个误区是把华侨华人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历史的经验证明华侨接受中华文化是有选择的，是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来决定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的。到了华人时代他们的选择更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很明显的在华人中有华语群体和非华语群体，在华语群体中随着当地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过去我们常常只注意华语群体而不注意非华语群体，只重视城市的华文教育，而不重视农村边缘地区的华文教育，这样必然将使我们的工作对象越来越窄。就是在城市的华语群体中不同的阶层对中华文化的需要也是不同的，以华文教育为例，随着华人的走向世界，一部分有条件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华人就会选择把子女送进英语教育学校而不是华文学校，这种情况在三十年前就开始出现在马来西亚，当前又出现在印度尼西亚，近年来由新加坡人在雅加达开办的国际学校越来越多，虽然学费比华文学校高过数倍，还是供不应求。而近日华文学校的华人子女则主要是只能留在本国生活。相当多数人没有条件受高等教育，还有部分人就是中等教育也不能完成，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华文学校就只能走国民学校的道路。而实际上他们最需要的是职业教育，可是现有的华文学校最缺的就是这方面的课程和专业。像这种还没有被我们完全认识，甚至完全不认识的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还有不少。但首先必须明确一点：他们对中华文化的需要是有选择的，不是我们给什么他就接受什么的，更不是可以主观的设想出一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就应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分工合作来做。如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经验教训，如何与国际资本打交道、如何扶持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解读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等。就不是就文化谈文化，就教育谈教育所能解决的，而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传播的必须是现代的观念、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文化，包括我们吸收其他文化传统的经验和消化其他文化的成果。

最后我们还必须明确，所谓传播中华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就既有外化又有内化，

我们要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输送给人家也要虚心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包括东南亚的社会文化和当地华人社会文化。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要平等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要互相学习而不是单方面的注入。

希望我们能够切实改变夸耀过去、显示强势的作风,为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